



学习总书记

中青班系列讲话精神

勇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者和继承者

□付红领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勤于担当，充分发挥文物在世界读懂中国人民中的重要作用。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推进高质量、高水平博物馆展陈工作，让各类博物馆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而且成为了解当代中国人民的重要窗口，在博物馆中感受中国人民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体悟中国人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从文物工作的角度，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让世界了解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昭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怎样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的乡愁。从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让更多文物展览走出去，让更多援外文物保护工程“立起来”，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找到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共同价值，打造中外民心沟通的桥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善于担当，充分发挥文物在世界读懂中华民族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研究阐释，通过区域性的文物遗存，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的历史来源。加强研究阐释，通过专题性的文物遗存，实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实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让世界广泛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深入理解我们的民族精神价值；让世界认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决心、诚心，多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中蕴含的当代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研究阐释，通过综合性的文物遗存，从目前的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56项世界遗产，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4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馆藏中，凝练并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以其庄严、崇高、鲜明、生动的形象，让世界更好认识到中华民族。

乐于担当，充分发挥文物在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作用。让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多次强调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多次强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文物事业改革发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作出重点谋划。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铸就了中华文化新辉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运用革命文物、红色典籍、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运用各类革命旧址、纪念馆、展览馆，讲好党的故事，讲好党为人民服务的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由此，如何正确理解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就显得尤为重要。破解了这个难题，就等于掌握了开启数据要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之门的“金钥匙”。

数据要素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要素涵盖了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环境条件，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坚实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事实上，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集中体现在这个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上。而生产要素又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范畴，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演变不同阶段的生产要素不断发生着分化和重塑，彼时的生产要素地位也在不断更迭变化。农业经济时代，恰如威廉·配第提出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那样，传统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主要取决于土地和劳力这两种资源。待到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诞生拉开了工业革命序幕，“机械化”时代的大规模机器生产迅速取代了人力，土地和劳力这两种主要生产要素逐渐让位于机器和资本。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爆发了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管理体系快速成为独立于资本之外的生产要素。20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技术知识上升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悄然而至，数据量和算力呈爆炸性增长，数据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正如量子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认为的，“万物源于比特”“信息（数据）是宇宙存在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可以说，数据正日益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已经来临。

数据要素呈现独特新特征。与土地、劳动力、管理、技术、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无疑是生产要素大家庭的“新面孔”。然而，它超越了传统要素的基本属性、作用形态和增值方式，一跃成为数据时代抢占领先跑道的战略资源。数据要素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数据要素具有非稀缺性特征。稀缺性是指资源因无法满足人类社会不断扩大的需求以及无法实现空间上的均匀分布而呈现出稀缺状态。然而对于知识、信息、数据等无形资产来说，它们因累积迅速且不占有空间而具有非稀缺的性质。数据要素的这种非稀缺性特征并非意味着数据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是有两重特定含义：一方面，数据在共享过程中可以实现指数级增长。数据传播链条越长，它的增量便如滚雪球般越发庞大。另一方面，数据可以在储存允许的前提下重复使用、循环使用乃至无穷尽开发，因而它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倍增效应。第二，数据要素具有强劲的流动性。流动性是生产要素产生价值的基本前提，不同生产要素的流程性程度存在天壤之别。土地流动性最弱，劳动力流动性次之，技术流动性适度，资本流动性较强，而数据流动性最强劲。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生产要素在流动过程中会呈现出形态迥异的特征。具体而言，劳动力流动和土地流转既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民在限定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技术能够作为商品流通的前提是它具有先进性，如此方能在不同国家、地域、行业内部（或之间）输出与输入。投机性和逐利性是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而资本在流动的同时常会和其他要素裹挟在一起发生裂变，因此它对经济社会推动作用更加显著。作为21世纪的国家战略资源，数据要素的流动呈现出速度更快、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特点，这也让它成为了生产要素大家庭中最富有增长价值的“潜力股”。第三，数据要素具有非排他性。排他性指一事物在一定范围内排斥另一事物的性质，而经济学视角下的排他性则指在技术上排斥他人使用的可能性，比如某人使用或消费一种物品时便阻止了其他人使用或消费该物品。由此观之，资本和劳动

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技术虽具有非排他性特征，但与数据相比则逊色三分。理由显而易见，数据本身具备的非常强大的复用效率使其可以按照既有模式在一定范围按照一定权限重复使用，这无疑彻底颠覆了传统要素的使用局限。第四，数据要素具有时效性。数据的重要程度与时间成反比，如超过规定时限，数据可能就变成没有意义的数了。比如，马歇尔曾用森林中树木与企业的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周期作比较，“岁月或迟或早都要对它们产生影响，他们逐渐失去活力”，当企业死亡（注销）后，再对该企业相关的数据作分析就毫无意义了。

数据要素催生经济社会新形态。数据要素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动能，更重要的是，它还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是数据要素加快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据统计，2012年到2021年10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12万亿元增长到45.5万亿元，在整个GDP中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我国坚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充分激发企业在市场分析、个性定制、算法推荐、智能制造、精准营销、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在管理方法、生产模式、组织形态等领域进行深刻变革，不断优化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链，进而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新零售”“新制造”“直播带货”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流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标配”。二是数据要素成为保障社会安全高效运转的助力源。数字时代给创造精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迸发空间。如“杭州城市大脑2.0”汇集了交通管理、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的数百亿级数据，展现出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窗口”的“头雁风采”。健康码则更是成为抓实抓细疫情防控、顺利实现“动态清零”的重要基础。三是数据要素有助于增强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政府治理目标。“无证明城市”让循环证明、奇葩证明成为历史，“一网通办”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变成现实。“跨省通办”推动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通顺运

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此走上快车道。“数据经纪人”则架起了政府、企业之间的桥梁，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着“催化师”的作用。

数据要素引发国家治理新挑战。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它在对传统生产力的内涵进行拓展和延伸的同时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急需高度关注。一是数据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数据是互联网安全全链，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二是数据共享开放问题。一方面，要消解政务部门内部数据共享中的“要数据比要饭难”困境，加快破除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三座大山”，清除制约数据共享的“拦路虎”，建立起按需共享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充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已然成为数字化改革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要奏响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乐曲仍需破解多重困境，让沉睡的公共数据“活”起来是摆在各级政务部门面前的重要议题。三是数据垄断问题。这实际上是发展和规范之间的矛盾之源。近年来，一系列案例映射出数据垄断正由传统的经济学概念演变为攸关国家主权的政治学范畴内的关键指征。四是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是充分激发数据要素潜能的“牛鼻子”。近年来，伴随着数据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兴起，数据交易所逐渐成为市场宠儿，不少城市竞相抢滩数据交易新赛道，成为这条赛道上的领跑者。但此时一些问题亦逐渐浮出水面：如何消解数据定价难这个世界级难题？除数据交易外有无其他激活数据潜能之路？能否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破题口，从数据要素生产、流通、配置、消费的全流程齐发力，重构新型数据生产关系？这些问题需加快逐一破解。

基层治理创新的五个支点

□蔡松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适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基层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群众智慧，接地气、讲协调、重创新、有实效。基层治理创新，关键要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治理效能，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日趋精细，才能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层基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指挥一体化。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一方面，加强各级党委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需要各级党委发挥大脑中枢作用，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设计、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尤其是县区党委需要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抓

统筹、聚合力，抓落实、创特色，乡镇（街道）党（工）委发挥“龙头”作用，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同时，加强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村（社区）党组织需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

优化组织架构，推进权责明晰化。组织架构层面需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通过县、乡、村三级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的优化，创新治理架构。做优县区“顶线”，县区党委侧重抓总。做强乡镇（街道）“中横线”，规范乡镇机构设置，做实模块化改革，按职能划分为乡村振兴、平安建设、纪检监察、组织统战等十大模块。做实村（社区）“底线”，坚持“分岗明责、网格管理”，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干部队伍。畅通“竖线”功能，加快推进市县社会治理中心、乡镇（街道）社会治理室、村（社区）网格工作站建设，形成党委领导、部门联动、线上线下协同的联动指挥体系。

聚集事权匹配，推进条块协同化。破解基层治理的权责不匹配问题，关键在于做好放权赋能。坚持试

点先行，重点推动一支队伍管执法、政务服务就近办和县乡协同事项联办三项改革，实现人员下沉、职权下放、服务下移，增强乡镇统筹能力。一是推进人员下沉，结合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抓好减县增乡、人员下沉。二是推进职权下放，以县区部门赋能基层、更有效满足乡镇（街道）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依法下放管理权限。三是推进县乡协同，编制县乡协同事项清单，赋予乡镇（街道）对协同事项的提请权、评价权，明确县乡协同事项的方式、运行流程、人员经费保障等，建立乡镇（街道）牵头、县区部门协同的联动机制。

实施数字赋能，推进流程数字化。一切努力都是在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急和所盼，全部奋斗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数字化这个好钢，必须要用在满足群众需求这个刀刃上。从信息时代智能互联大背景出发，技术革新给基层治理创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是时代之需。以数字化信息化赋能基层治理精细化，着力提升治理智慧化能力和水平，就一定能够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

化、便捷化水平，更好造福人民群众。为此，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始终坚持以“让群众办事更方便，让政府管理更高效”的理念，把数字专项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搭建基层治理数字平台架构，实现整体态势“一张图”、基层治理“一网格”、指挥调度“一流程”、数据联动“一端口”、政策赋能“一码通”。

以结果为导向，推进考评多维化。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识别干部是否是真担当、真作为，重在考准考实，避免雾里看花。在推进基层治理实践中，一方面，需要盯紧且解决督而不用、考而不实、督察脱节等问题，成立督查考核委员会，将日常督查与综合考评、奖惩激励深度融合，创新开展“三评两比一综合”考评。另一方面，从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不同层面对领导干部进行多维考评，做到一个干部一个特写，精准识别干部的德才素质和实绩表现，激励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躬身入局、挺膺负责、实干立身，归根到底要以结果为导向。

（作者系河南省信阳市委书记、大别山干部学院党委书记）